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分析五四前后的外国文学翻译

陈萍

新疆师范大学 乌鲁木齐 830017

摘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人们逐渐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角度从事翻译研究,多元系统理论相对于传统静态的翻译理论,对翻译研究进行动态化和系统化的研究,推动了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五四运动”前后,外国文学翻译在文化地位、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等方面都受到当时中国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本文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出发,基于历史背景,分析“五四运动”前后国内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原语文本选取和译者翻译策略,从而进一步地深入了解影响“五四运动”前后的外国文学翻译的因素。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文学翻译;文本选择;翻译策略

一、引言

翻译研究聚焦于语言本身,关注译语和原语之间的对比。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倾向于“文化转向”为标志的翻译研究,并且形成了相应的学派,翻译研究一个全新的视角——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作为翻译研究的理论逐渐兴起。

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提出多元系统理论,指出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既曾处于“中心”位置(primary position),也曾处于“边缘”位置(secondary position)。在某个特定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当译者采取异化译法和归化式的翻译方法时,翻译文学分别处于“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伊塔马·埃文-佐哈尔,2002:19)。本文旨在探究“五四运动”前后(1911-1937)中国的翻译文学概况,从而分析这一时期对中国翻译文学中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翻译文学地位产生影响的因素。而选择这一历史时期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内发生了著名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多变化,各种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五四运动”也成为了我国翻译文学的一个“分水岭”。

二、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多元系统理论是由佐哈尔(2001)于1972年提出的,该系统强调要把各种社会符号看作多元系统,而这个系统又是由多个不同系统组成的,即各种文学子系统的集合,可以用一系列对立的系统来描述。各个子系统之间始终保持非稳定

状态,因此翻译文学并不总是处于边缘地位的,有时也会处于中心位置。

由多元系统假说可得知,当中心位置被翻译文学给占据时,新的一级模式将由翻译所参与创造,翻译与创作之间的限制性降低,此时大多数译者会违背译语文化的规范,重点关注译文的“充分可能性”,采取异化式翻译(Even-Zohar, 2001:196)。反之,当翻译文学处于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难以深刻影响译入语文化中的主流文学,它便趋于保守,翻译策略的选择倾向于强调译文的“可接受性”(Even-Zohar, 2001:197)。

三、“五四”前(1911-1919)国内翻译文学概况

(一)历史背景

要理解特定时期的翻译文学,必须明确这个时代的历史环境。经过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沉重打击之后,中国的有志之士认识到,要想与列强抗衡,就需要“开启民智”,于是他们转向西方。

20世纪初,我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1911年,孙中山领导发动了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此后,西方大量的民主思想和社会思想如潮水般涌进中国。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但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得人们在思想上无法接受军事战败这一事实,仍然秉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观点。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翻译重心从自然科学转移到了社会科学,翻译的主流逐渐变为文学翻译。

后来直到“五四”运动，中国落后于西方这一事实才被承认，同时，它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翻译文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二）“五四运动”前国内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

在世界文化这个大多元系统中，中国文化与相对强势的西方文化相比，明显处于劣势的“边缘”地位。但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处于“中心”位置，因此译者在翻译策略上采用异化法，符合原语文化的标准规范。

但和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文学翻译家们尽管已经意识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但文化优越感仍植根于其思想观念之中，体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被引入中国，但在翻译中，译语规范性还是处于主导地位，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

综上所述，翻译策略最终决定权还是在译者自身，因此还需综合考虑译者的文化态度。

（三）原语文本的选取

这一阶段翻译文学的宗旨是开启民智。在翻译材料的选取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趋向：一些偏向“弱国模式”的学者倾向于翻译与中国遭遇类似，并同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的文学作品，旨在将“不变革必亡国”的思想传播给民众。一大批如胡适等翻译家，因觉醒国人的动力而从事文学翻译，他们不以“揭示弱势国家的悲惨现状和其根源来觉醒国人，而是试图通过向民众宣传强国的思想文化来改变国人的思想”（王友贵，2003：14）。

“五四运动”前的翻译文学主要集中在科学小品、侦探小说和政治性小说，特别是政治性小说。小说之所以被选作社会改良的工具，不在于其文学或美学功能，而在于其社会价值。梁启超和林纾是典型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认为要实现改革维新之目标，关键在于开启民智，积极发挥小说在社会中的引导作用，“译书中小说最为重要，而小说中又以政治小说与社会联系最为密切”（谢天振，2003：118）。基于这一观点，他的翻译文学作品以政治小说为主，并且很重视其所表达的主题。林纾开始翻译小说时，也欲开启民智。1899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并获得一致好评。20世纪初期，在林纾等人的影响下，出现了一股翻译出版西方文学的热潮。然而，林纾的译本也存在诸多限制，由于林纾不懂外文，因此他的译本存在漏译和误译等问题。

尽管这一时期的学者都积极提倡向外国小说学习，但

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层面（袁进，1992：84）。

（四）译者的翻译策略

对译者的翻译策略有着关键决定作用的就是翻译文学的客观文化地位。另外，译者的文化态度也会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那个时代，小说被认为是一种改造社会的手段，所以译者在翻译时，并不注重对原文的“忠实”，而在于适应晚清社会和文化潮流。译者为使译文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常常采用译述法，因而经常出现夹译夹作、改写改译的现象。清末，虽然白话文运动正在兴起，但许多译者仍坚持采用古文译本，人们认为中国无需借鉴西方文学的表达方式。因此，“五四运动”前期的文学翻译主要采取归化译法。

文化地位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主观意识，所以翻译文学策略的确定最终还是取决于译者自身。由此可知，多元系统理论无法充分解释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出现的各种现象。

四、“五四运动”后（1919-1937）国内翻译文学概况

（一）历史背景

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有志之士不得不重新寻求救国之法。由此展开了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有力地促进了旧的封建文化转向民主文化，在此基础上大量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使我国的文学翻译达到空前的高峰，并存在译者共用归化译法和异化译法的现象。

（二）“五四运动”后国内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

在此期间，由于各种外国思潮不断地涌入中国，使得中国的翻译活动达到顶峰。在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影响下，许多作家和翻译家也都积极倡导借鉴国外的语言，以充实中国的贫瘠语言，认为翻译“不仅要学习新的内容，也要学习新的表现形式”（陈福康，2000）。通过吸收外来文学的养分，实现对文学的改造，进而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模式，而翻译文学也从边缘位置转向中心地位，即多元系统理论中提到的第三种情况。

（三）原语文本的选取

“五四运动”之后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历史阶段，而在翻译文本的生存与接受过程中，政治文化也是其

主要的生态环境。“五四运动”后，苏俄和其他国家的先进文艺著作以及文艺理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开始被我国译者大量翻译。在翻译形式上，文言文被白话文所取代。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译者和文学创作者倾向于与中国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的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

俄国和一些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作品，受到我国翻译学者的欢迎的原因有两点：一是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就被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传播，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二是在世界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虽然“弱势”国家的文学作品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但我国译者仍试图通过与这些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以觉醒同胞的民族危机意识。

（四）译者翻译策略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文学翻译也迎来了新的爆发式增长阶段。在翻译策略上，文言文被彻底废除，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极大地促进了汉语的标准统一。

其次是当时中国的一些译者提倡“欧化”，认为西方语言的长处应该要借鉴和吸收，以增强本族语言的表达能力。根据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当时中国的翻译文学在翻译策略上应尽可能地采取异化译法。但是，在那个时代，“直译”和“意译”是共存的，鲁迅等左派先进力量忧虑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正确对待文化地位落后的现实，大力提倡向西方文化学习，因此，他们的翻译策略有异化的趋势。而梁实秋等右派文化力量则偏重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力图捍卫封建文化，翻译策略呈现出鲜明的归化色彩。因此，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在同一历史阶段的相同文化背景下形成了。

五、结语

相对于传统的翻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并没有以单一

的静态文本研究来评价早期的翻译研究，而是把翻译研究置于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下，对其展开动态化和系统化的研究，推动了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这一理论基于西方的文化理论框架，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的各种文学现象，原因在于该理论仅从客观的文化因素出发，忽略了译者的能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张南峰.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04):21-27.
- [2]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3] 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118.
- [4] 王友贵.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J].中国翻译,2003(5):14.
- [5] 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84.
- [6] 于德英.用另一只眼睛看多元系统论多元系统论的形式主义分析[J].中国翻译,2004(5):10-14.
- [7] Even-Zohar, Itam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A]. Laurence Venuti(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reprinted)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192-197.

作者简介:

陈萍(1999-),女,新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E-mail:847185186@qq.com。